

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 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

孙邦华

内容提要 王韬出生于苏南吴中地区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小所走的道路,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所行的一条寻常之路:入私塾,习儒家经典,应科举考试。中秀才后,一次乡试落榜,加之不喜空疏无用的帖括而欲弃科举。随后,为了承担养家的重任,承袭父业,远走上海为西人佣书。在高堂、亲朋及师友的一再劝导下,被迫回到考场,但也只是草草毕试。十年科举路,一把辛酸泪。中年时期,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科举改革、废八股、停捐纳。在晚年生活潦倒的情况下,仍花巨款例捐“广文”虚衔。透视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科举制度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始终笼罩着天下读书人及其家庭。

关键词 王韬 科举制度 八股文

孙邦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100875

在中国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拔统治人才的一种考试制度,在此制度之中,人——芸芸应考者,是它的主体与核心。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不能不关注此一制度下的“人”。金榜题名者在奋斗的过程中历尽了苦难;名落孙山者从过程到结果都写满辛酸。对应考者心路历程的研究是对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对科举考试失意者心路历程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王韬(1828-1897),早期维新思想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巨擘,科举考试的失意者。目前,学术界对王韬青壮年时期在上海、香港、英国所从事的译书、办报事业以及晚年主持上海格致书院等活动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对他青少年时代的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关注不多。本文利用其现存日记、诗文、尺牘、自述等个性化的史料,通过对王韬参加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的分析,以探究普通读书人对科举制度的复杂态度,以便多角度地认识科举制度对人和社会的影响。

一、读书与应考的寻常之路

王韬世代生活在苏南吴中地区,这里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化教育之乡,科举盛地,当地人有“状元是苏州土宜”的民谚^[1]。王韬出生于吴中地区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所走的道路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所行的一条寻常之路,入私塾,习儒家经典,应科举考试。

[1] 龚炜:《巢林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6页。

王韬,1828年11月10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府下辖的新阳县甫里村,原名利宾^[1],小字兰瀛,人呼阿兰^[2]。后改名瀚、畹、韬,字仲蘅、仲弢、子潜、紫诠、无晦,号懒今、兰卿、天南遁叟、甫里逸民、弢园老民。王韬祖先王氏原本世居江苏昆山,为当地巨族。他晚年自述家族史时言道:

“老民世系本出昆山王氏,有明时巨族也,族中多有位于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阖门殉国难,始祖必宪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线,自此至晋侯、诒孙、载颺,居昆凡四世,并读书习儒业,有声庠序间。载颺讳鹏翀,品端学博,尤为士林所推重。以早逝,子尚幼,戚串中有覬覦者,乃迁甫里。”^[3]从王韬的自述中,我们可知以下信息:第一,他出自昆山王氏官宦之家,有过显赫的家族史,明代有多位先人曾在朝为官,为当地名门望族。第二,在明末战乱之时,几乎遭受灭族之难,始祖王必宪因为未及成年,才得以幸存下来。第三,自始祖王必宪算起,在昆山生活了四代。第四,自始祖开始,家道中衰,未再出过官员。但是,形成了自幼“读书习儒业”、参加科举考试的传统,“有声庠序间”。曾祖父王鹏翀,字载颺,中过秀才,曾经入选昆山县学廪膳生,授候选训导官,设馆授徒。“品端学博,尤为士林所推重”,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取得举人及以上之功名。第五代,即王韬的祖父,幼年丧父,为避开家族中的矛盾,从昆山迁到当时属新阳县的甫里村。王韬讲述祖父和父亲在新阳县甫里村学业和生活的情况时说:“大父讳科进,字敬斋,习端木术,笃厚慎默,见义勇为,乡里称善人。父讳昌桂,字肯堂,一字云亭,著籍学官,邃于经学,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家贫,刻苦自教授生徒,足迹不入城市。”^[4]

从上文我们了解到,王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祖父名“科进”,长辈希望他读经、史之书,走科举仕进之路。但是,他在科举考试上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在经商方面获得了成功,家庭富足,且乐善好施,而被授予五品职衔,晚年又被特举参加乡饮酒礼,在当地是有影响的乡绅^[5]。父亲王昌桂,从小诵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伏念累世以茂才教授乡里,栖贫食澹,代有清德”^[6]。考中秀才后,成为新阳县学增广生。于是,一边在本村(甫里村)和附近的吴村设馆授徒;一边“刻苦自励”,参加乡试。虽未中举,但为王韬少时的教育提供了条件。

母亲朱氏亦出自文教之家,知书达礼,因之,能够对幼年的王韬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王韬说:“老民母固知书识大体,四五岁时,字义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纳凉,率为述古人节烈事,老民听至艰苦处,辄哭失声,因是八九岁即通说部。”^[7]

父母从小对王韬进行识字和经史教育,为他一生的学问打下了良好基础。“老民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学业悉基于此。”^[8]12岁,从父学。“十二岁,从先君子读书吴村,一住五载,一切学问悉基于此。十七岁,先君子授徒于家,乃返。”^[9]得父亲的遗传和教诲,王韬学业优嘉:“少好学,资赋颖敏,迥异凡儿。读书数行俱下,一展卷即能终身不忘。一乡之人咸啧啧叹羨曰:某家有子矣。”^[10]12岁开始学作诗,并养成了边读书边写作的习惯,终身不变。“余少即好拈弄笔墨,十二岁学作诗,十三岁学作笺札,十四岁学作文,有得即书,不解属藁。人或有索观者,立出示之,无所秘;或有加以毁誉者,亦漠然无所动于心。”^[11]这里所说的“作文”,应该包括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

王韬曾经进入本村私塾青萝山馆学习,私塾馆主名叫顾惺,字涤庵,号青萝山人,贡生,王韬称他为明经师。王韬曾赋诗赞老师的文章堪比韩愈、柳宗元、李翱、阮籍:“青萝馆里碧琅玕,一片阴森六

[1][3][4][7][8][9][10][11]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孙邦华编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1页,第1-2页,第1页,第17页,第17页,第18页,第17页。

[2]王韬:《漫游随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5]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6]王韬:《拟上合肥相国》,王韬:《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3页。

月寒。曾否新诗钞十手，定知好竹长三竿。文章小技惭翰籍，衣钵名山托柳韩。”^[1]

聪颖好学的王韬当时大约17岁，正是意气风发之年，充满了振兴吴中诗学的崇高理想。王韬在一首题名《小饮青萝山馆呈顾涤庵师》诗中描绘了他登堂入室之际的心境与志向：“酒阑每易生感慨，敢抒愚论披心肝。伊昔操笔才舞勺，其时我犹未识韩。文章麓解蒙公许，岂有群书卓犖观。今日幸备弟子列，步趋敢曰升堂难。中吴诗学久不振，谁执牛耳雄高坛。金陵流派工簸荡，公其挽之排狂澜。佻淫积习翼一变，目笑群儿肆击弹。灵芬秋水虽后起，清新渐趋为雕刊。”^[2]

他在这里饱读了经学、小学、诸子学、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诗赋等书籍，这对他后来的学术与思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43年，16岁的王韬第一次走进考场，到昆山参加县试。年少气盛的王韬下笔如飞，为文气度不凡，主试者县令杨耕堂，“见余文，击节叹赏；以余在幼童列，文颇不凡也”^[3]，结果而中，自命“补博士弟子员”。邻里乡亲闻讯纷纷前来祝贺，族兄称赞他是“千里驹”。王韬对县试的成功并不自满，他说：“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不然，宁以布衣终老泉石，作烟波钓徒一流人也。”^[4]初试告捷，维固了王韬治国平天下的勃勃雄心，对科举考试的前途信心十足。

1845年，王韬18岁，旧历乙巳年，时为清季学政赴省内各地主持科试之年^[5]，王韬赴昆山应考，考题为“见于孔子曰季氏非人所能也”，督学使者为江南学政、陕西泾阳人张芾（字小浦、筱坡），称赞王韬的作文“文有奇气”、“拔冠邑庠”^[6]，遂以一等第三名入县学^[7]。

1846年秋七月（农历），是三年一次的乡试，弱冠之年的王韬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江苏省乡试^[8]，他的启蒙老师顾惺一同前往应试，结果同行的几人全都名落孙山。王韬如此聪颖好学，写出的诗文又有“奇气”，他为什么未能一试中举？

大凡科举考试，应试者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失败的原因可能只要一两种。王韬的失败首先是他的性格使然。王韬自幼聪明，但狂傲自负，诚如他后来所说：“忆在弱冠，志锐气壮，自以为可奋迅云霄，凌躐堂奥。讲学则摧锋折角，谈诗则祧宋宗唐^[9]。初不料忧患乘之，而竟至于斯也。”^[10]一再以当代韩愈等大家而自诩，而被称为“狂生”、“狂客”^[11]。他不仅狂傲，而且放荡不羁、风流成性。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甚至是在风蚀残年之时；无论是在科举应试期间，还是在平常生活之中；无论是在吴门老家、金陵秦淮河两岸、上海十里洋场，还是遁迹香港期间，甚至东渡扶桑之时，始终喜欢和

[1][2]王韬：《蘅华馆诗录》，顾廷龙、傅璇琮主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5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第439页。

[3][8]王韬：《漫游随录》，第51页，第52页。

[4]王韬：《菽园老民自传》，第153页。

[5]清朝的院试分为岁试、科试，每三年举行两次，由朝廷任命的学政到各府、州、县主考，丑、辰、未、戌年的考试称为岁试；寅、巳、申、亥年的考试称为科试。

[6]王韬：《瓮牖馀谈》，[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页。

[7]王韬在《菽园老民自传》中说自己“十八岁，以第一入县学”，有些夸张，或者说把“第一等第三名”简称为“以第一入县学”。据学者查证《昆新青衿录》（光绪二十年编刊）：“道光廿五年乙巳张宗师科试新生学榜”，共录取新阳县诸生共13名，“王利宾兰卿”列“一等第三名”。参见忻平：《王韬评传》，第8页；参见张志春：《王韬年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9]王韬在日记中所附书信。原句是“谈诗则祧唐宗汉，讲学则摧锋折角”。（王韬：《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2页。）两者对照，不仅前后句互换，而且内容稍异，后来，王韬在出版《菽园尺牍》时，将“祧唐宗汉”改为“祧宋宗唐”。

[10]王韬：《奉顾涤庵师》，王韬：《菽园尺牍》，第134页。

[11]忻平：《王韬评传》，第431页。

一些志趣相投的文人饮酒征歌、寻芳勾艳、咏诗绮靡，俨然是继唐伯虎之后的又一名江南“风流才子”。当他的妻兄杨延绪写信批评他生活放荡时，他却认为，儿女情长是中国文人本色，自古贤士也不能免。“至于绮靡障碍，未能屏弃，亦是文人罪孽。然秾艳风华，乃其本色，儿女之情，古贤不免。此亦只与瓯茗炉香，供消遣而已，不足为学业累也。”“子宁以他规我，勿徒屑屑于其末也。”^[1]王韬所谓寻花问柳“不足为学业累”只是为自己风流生活的辩解词，实则正是由于这一本性阻碍了他在科举道路上走得更远。试想一个人在应试期间也无所收敛，“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和青楼之间，还有心思和精力应考？正是这一本性，不仅葬送了他的第一次乡试，而且影响到了此后他对八股文的看法，乃至抱着对科举考试若即若离的态度。

二、“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

1845年，王韬中秀才之后，即改名为“瀚”，意谓浩大宽广，以示对未来前途的憧憬，但是，这种憧憬之情和自信心只保持了不足一年。“十九岁试京兆，一击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2]文士之人屡挫于科举考试本是平常事，王韬为什么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就会产生“薄功名而弗事”的想法呢？实际上，他真的能够轻易地放弃万人趋鹜的科举之路吗？

王韬首次乡试不中，遂产生厌弃科举考试的心理，主要是由于他不喜欢作八股文，即所谓时文、帖括。他说：“顾性不喜帖括，十九岁应秋试不售，归即焚弃笔研。窃视同里闲诸友，于帖括外无所长，亦无所好，未尝不隐笑之。然余有所作，即示人，人亦不欲观，咸轻视余，若以余不知文章为何物者。尝作一书托人转达所知，久不见答；及询其人，乃知以书中无要言，未之达也。呜呼！彼之所谓文章者，时文耳，所谓要言者，俗事耳；宜其与余初不相入也。”^[3]

王韬为何不喜欢八股文？首先是因为八股文对文章的格式、字数、思想都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不能有丝毫个人的发挥，这与他身上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其次，他认为八股文不能帮助文人学士寻求治国之道，因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嗟乎！于时文中求经济，吾未见其可。”^[4]

1859年2月，他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到实际的角度对八股文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批判。他说，明朝之灭，“岂非明太祖以时文取士之咎哉”，“夫时文仅优孟衣冠耳，其能代圣贤立言者，谬也。诂经不能究其精深，言理不能阐其奥妙，自少至壮，精神全注于是，而无暇旁及于用世，以为无足重轻，略焉不讲，一旦有事，岂复可用。其侥幸弋取科第，出作民上者，刑名钱谷，自有承乏之人，胥吏纵弊，亦瞢然无知。其有留心经济者，则群笑以为迂，且有穷老终身不复用者”。他痛斥八股文耗费了士人的青春年华，无真才之学，无用世之才，于是，较早地发出了唯有废除八股文才能兴利除弊的感叹：“不废时文，而天下之弊岂可骤除哉？”^[5]

“十九岁，余馆锦溪。二十岁，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门。”^[6]乡试落第后的王韬回到家乡，不久应人邀请，在距离老家甫里村20里的锦溪镇设馆授徒，承袭父业，初为塾师。“舟子晓发叩门至，持书促我锦溪行。锦溪此去只廿里，风便挂帆顷刻耳。春水涟漪溪涨平，荡漾荇藻生空明。小艇摇摇日未午，大河前横路若阻。烟深岸阔不见人，独听空江响柔橹。”^[7]“馆中童两三，垂髫皆幼小。吾愧为人师，诱以理易晓。”^[8]第二年，父亲远走上海，王韬乃回到甫里村授学。书馆中的学童年纪幼小，而且人

[1] 张志春：《王韬年谱》，第14页。

[2] 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王韬：《弢园尺牍》，第75页。

[3][4] 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第22-23页，第24页。

[5] 王韬：《王韬日记》，第88页。

[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64页。

[7][8] 王韬：《蘅华馆诗录》，第439-440页，第447页。

数极少,教学十分轻松,因此,有大量时间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书籍。此时他欲弃科场,致力于诗文、经史,“于是,杜门息影,屏弃帖括,肆力于经史,思欲上抉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而用世”^[1]。“名场征逐不得意,出口都成危苦辞。方今俗学工相皮,文字高寒识者稀。读书岂徒弋科第,力古乃不救寒饥。”^[2]王韬打算以十年之功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以“上抉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立下“出而用世”之志。要实现用世之志,或须作一方之长,或须居庙堂之上,但是,在科举时代,这样的用世者必须是科举正途出身,而且一般是进士,甚至是翰林,否则,纵有满腹经纶,也难有经世治国的机会。这说明,王韬尽管意欲屏弃帖括,但是无法彻底与科举决裂。

三、“高堂属望殊殷,不得不以举业自励”

王韬对科举之路心灰意冷,因此,要把王韬重新拉回考场,必须具备必要的外部因素。综合分析,其外部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同学少年相继金榜题名的刺激;二是家人的期望与压力;三是亲戚、朋友及老师的规劝。

首先,同学少年相继金榜题名的刺激。尽管自己一再说明弃帖括而致力于经史之学,但是,眼见别人、特别是同学少年如愿博取功名,自己则相形见绌,难免触动其心。正如他所言:“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编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潜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3]

其次,光宗耀祖的希望系于王韬一人之身。王韬为数代单传,“自始祖必宪至今二百四十余年,七叶相承,五代单传,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没。于是自明以来,巍然硕果,仅存老民一人而已”^[4]。王韬出生之前,原本有过三位兄长,但是“十日间,俱以痘殇”,后来,父母不得不上寺庙烧香求子,生下王韬,终于养活成人^[5]。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名叫王利贞,字芷卿,但仅27岁而卒^[6]。1846年,王韬大婚,娶同村举人、四川知府杨隼的第三女杨保艾为妻,婚后王韬为之改名“梦蘅”,婚后仅4年而亡,续娶林琳,字怀蘅。王韬膝下无子,仅育二女,长女嫁秀才钱征,早殒,二女为哑巴。下曾有过三个从侄,但是,也相继夭折。曾经的吴门望族至王韬辈开始绝后,在传统社会里,还有比整个家族绝后更不幸的事吗?因此,王韬只能徒叹上苍对王氏不公:“老民族党无存,密亲盖寡,侧身天地,形影相吊,岂天之生是使独欤?老民每一念及,未尝不拔剑斫地,呵壁问天也。”^[7]父亲曾经参加过乡试,但到死也只是秀才。兄弟二人,王韬充当起了教育弟弟王利贞读书的任务。“思先君子见背以来,缔构门户,艰劬倍至,折桂炊玉,裹盐乞醢,琐屑之事,惟恃一人。中间筑圻营葬,为弟授室,心力耗瘁。”但是,弟弟却不成器,“兼之舍弟读书未就,学贾不能,呼吸烟霞,已成痼癖,迷津难返,凡百堪忧”^[8]。不久,弟弟英年早逝,整个家族仅存王韬一名男子,获取科举功名、振兴家道,只能寄望王韬一人了。尽管王韬因不喜帖括而厌弃科举,怎奈母亲常常念叨光宗耀祖之事。母训难违,祖宗的期望怎能就此烟消。

再次,亲戚、朋友及老师常常规劝王韬重回“正途”。1849年,王韬的父亲突然去世,“上奉高堂下教弱弟”的任务一下子压在了王韬的肩上,塾师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养家活口。为了全家的生计,他不得不接受西方传教士的邀请,承袭父业,到上海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为西人

[1]王韬:《与英国理雅各学士》,王韬:《弢园尺牍》,第75页。

[2]王韬:《蘅华馆诗录》,第439页。

[3][4][5][6][7]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第21页,第7页,第2页,第6页,第7页。

[8]王韬:《王韬日记》,第67页。

佣书^[1]，“己酉六月，先君子见背，其时江南大水，众庶流离，硯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麦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贻书劝行，因有沪上之游”。“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计，不得已橐笔沪上”^[2]。当时人们严守夷夏之大防的思想。前一阵王韬还在大谈“华夷之辨”^[3]，现在自己又做起以文事夷的事来，当然会遭人讪笑。更为严重的是，他是在帮助传教士翻译《圣经》，可谓“倒行逆施”之举，于是招致“名教罪人”的骂名。“目论之士，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在国人的笑骂声中，王韬感到“留则百喙莫辨，归则半顷未置”，“名誉不立，进退维谷”，心中“惘惘不乐”^[4]。在西人的眼里又如何呢？尽管王韬多次表示，他与雇主——英国传教士之间的关系“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5]。但是，绝大多数来华西人总是在中国人面前高高在上，“待我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如犬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见我文士，亦藐视傲睨而不为礼”^[6]。佣书活动也是供西人驱使，“名为秉笔，实供指挥”^[7]。王韬每想到此，不仅心中不快，而且很后悔这一“失足”行为。“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由此看来，王韬从西人佣书，只能是为了全家生计的临时工作，“虽然，已往者不可挽，未来者犹可致，以后余将作归计矣。”^[8]他将“归”向何处？

正是在王韬偏离“正道”而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他的亲戚、朋友及老师不断致信劝他回归科举正途。譬如，长王韬4岁的妻兄杨延绪（号醒逋、莘圃，秀才），自从王韬娶其妹后，二人来往密切。妻兄不仅自己“沾沾于科第”，多次奔波于昆山和南京之间，屡考屡败，屡败屡考，而且多次劝告王韬：“科名者士子之进身，非得之不足为孝，以是为仆劝，其意不可谓不厚”；“尝谓吾里不登贤书者数十年，而以功名相勸勉”^[9]。王韬与其师顾惺关系甚密，亦师亦友。师徒二人曾于1846年同赴南京应乡试，双双落第。在王韬对科举失去兴趣与信心之后，顾惺在书信中时常给予劝勉和鼓励。

其实，王韬的内心十分矛盾，他因不喜欢八股文而寡趣于科举，但是，长辈的希望与亲友的劝说，使他深感压力重重，该何去何从呢？当妻兄对他把功名与孝道联系起来时，他申辩说：“然仆闻有一时之孝，有百世之孝。吾人立天地间，纵不能造绝学，经纬当世，使天下钦为有用之才，亦当陶冶性灵，扬摧古今，传其名以永世。若不问其心所安，博取功名宝贵，以为父母光宠者，乌足道也。……况士各有志，仆不能强足下为古，犹足下不能强仆趋今也。”^[10]

在王韬看来，博取功名只是成一时之孝，尤其是一想到要致力于自己厌恶的八股文，于心不安，望而却步。如果潜心研究经史之学，不仅可以“陶冶性灵”还有可能达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高境界，从而传名永世，这才是他追求的百世之孝。“要读人间未见书，纵横蝌蚪辨疑似。不屑沾沾兔园册，以此弋第夸乡里。我闻君言意爽然，士各有志惟其是。”^[11]面对亲戚朋友的劝说，王韬可以暂时不顾，而对母亲的期望与训诫能不听吗？“今春友人书来，规韬致力时文，以图进取，且高堂属望殊殷，不得不以举业自励。”^[12]因此，王韬在思想及其矛盾的情况下，陷入如此痛苦的生活：每次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即宣布屏弃时文，然而，在母亲的训诫、催逼和亲戚朋友等的劝说下，“功名之心已如死灰嘘而重燃”^[13]，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返回科场应试。

1848年（戊辰年），再赴昆山参加岁试，以便取得来年秋天的乡试资格，“自是名心犹未淡，明年相

[1]佣书，古代指被人雇用做抄书之事。王韬父子先后被墨海书馆雇用襄助西方新教传教士翻译西书的活动。由于王韬等中国学者不通西文、西学，在相当长时间里，译书的方法都是先用西人用中文逐字逐句口述西书中的内容，中国学者对所述内容笔录下来，然后再由双方润色修改，再付梓印刷。因此，当时的译书是由西人起主导作用，中国学者只是微不足道的辅助角色，近似“抄书”而已，王韬于是自称为西人佣书。

[2][5][9][10][12]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第30页，第30页，第20-21页，第20页，第23页。

[3][4][7][8][13]王韬：《王韬日记》，第14页，第67页，第65页，第92-93页，第132页。

[6]王韬：《与周弢甫征君》，王韬：《弢园尺牍》，第26-27页。

[11]王韬：《蘅华馆诗录》，第456-457页。

约看金焦”^[1]。在顺利通过岁试之后,不料其父于次年夏病逝于上海。这时,王韬为了全家的生计,而被迫承袭父业。他为此致信妻兄,宣布放弃同赴南京参加当年乡试的约定,“今秋白下不复游矣。歇后郑五,自知夙明,何敢作非分想耶?金焦两峰,让与足下饱看。”^[2]

1853年(癸丑年),为岁试之年。在老母及其他亲友力劝下,不得不再事举业。但是,“至于帖经一道,素非所嗜,焚弃笔砚已阅五载”^[3]。于是,为了提前准备这次岁试,1852年春,经人介绍,拜上海辅元堂江翼云为师,学习八股文,但不用心。王韬如期自上海回昆山应岁试,主试者以范石湖《吴郡志》所载鲈乡亭为题,“当时场中莫有知者,予亦以无书可查,遂置之。”^[4]希望再次落空。

1856年(丙辰年),岁试年,秋九月回昆山参加岁试,仍未成功。

1859年(己未年),岁试年,在妻兄杨延绪、老师顾惺的劝说下,于旧历二月,与上海的几位朋友一同乘舟赴昆山应试。昆山、新阳两县学的四书文题目为《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五经义题目是《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诗题为《岭上晴云披絮帽》,王韬“草草毕事而出”,说明他并未认真准备,而抱着到此一游的心理。试后,登上当地的马鞍山题壁诗,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重见故山余涕泪,喜从老友话平生。文章忧患兵戈感,身世悲凉儿女情。何日买田容小隐,好寻泾畔结沅盟。”^[5]

1859年,江苏省乡试(恩试),由于自1853年3月以来,南京一直被太平军占领,三年一度的乡试无法举行,经清廷批准,此次乡试借浙江杭州贡院举行。邱伯深给王韬写信,劝他务须参加,“以酬先人未竟之志”。王韬原本属意这次难得的乡试,但他终究未前往应试。他说:“奈予于帖括一道,束诸高阁者已十余年矣,今复欲执笔为此,断不能如时世妆之争妍取怜也,因此功名之心益灰。虽有名师益友,亦不能鞭策矣。”^[6]其实,除了厌弃八股文之外,还另有原因。当时江苏省政府为了筹集经费,规定苏州、常州、松江等三府的生员每人捐钱四千,监生、贡生每人捐钱八千,才能获准应试^[7]。身负养家重担的王韬,当时为西人佣书,每年可得二百余金。因此,这笔捐款对王韬来说难以承受,所以放弃了赴考机会。

王韬因为涉嫌上书太平军将领的事而遭到清政府的通缉,1862年10月,在上海墨海书馆传教士和英国驻沪领事的帮助下,遁迹香港。王韬从此真正与科举考试绝缘,1859年昆山岁试成为了他一生应试的绝唱。他为此感叹道:“已薄功名等刍狗,徒工文字学妃豨。乾坤多难身还在,忠孝无成志竟违。”^[8]

综合上论,王韬在他首次乡试(1846年)不中之后,即宣称“遂薄功名而弗事”,但是,在各方人士反复劝说之下,他又先后四次回到考场,参加岁试。即使获得了乡试资格,也一再放弃乡试的机会,最终还是辜负了长辈和好友的期望。他在1859年所写下的一首诗,道出其无奈的心理:“不工文字不争名,潦倒粗疏了此生。四海无家惟有泪,十年壹意作孤行。人为宕子求闲境,诗入商音失正声。骨相穷愁心性懒,敢言吾业竟能成。”^[9]

四、离弃与回归

王韬与中国传统社会千千万万的普通儒生一样,从小走的是一条读书应考的漫漫科举长路:读书—应考—落第—再考—落第—再考,为此他不得不在甫里——昆山—南京—上海—昆山之间来回奔波,为功名所累,身心疲惫,他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过上陶渊明那样的悠闲生活,“人生苦为微名

[1][8][9]王韬:《蘅华馆诗录》,第449页,第470页,第459页。

[2]张志春:《王韬年谱》,第19页。

[3]王韬:《菉园老民自传》,第23页。

[4][5][6][7]王韬:《王韬日记》,第110页,第97-98页,第113页,第113页。

累,不然种秫谋日醉。但力耕田闲读书,安辞长作农家居。未知此乐何时,吾言不食如此酒”^[1]。但是,这种生活对王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或空想,“世间好事那有此,得闲萧然读书史。”“我少即为衣食驱,十年辛苦徒劳耳。”^[2]假如不是他因为遭通缉而被迫潜迹海外,对科举考试或将难说再见。

王韬对待科举的态度和行动是十分矛盾的,少年聪明好学,意气风发,目空一切,博取举人、进士等功名似乎轻而易举。但是,厌弃时文,不愿为这种空疏无用之文而折腰,因而一次又一次想离弃科举,但是,在长辈、亲朋及师友的压力和劝说下,不得不回归。由于他极不情愿作八股文,对待应试也只是抱着到此一游的心态,“草草毕事”而已。八股文成为王韬科举道路上的拦路虎,是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以至于在19世纪70至80年代,他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发表“变法自强”主张时,将对八股文的批判和科举制度改革作为“变法”的核心。他认为,八股取士之道的问题在于:“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数百年而不悟,若以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进身,其谬亦甚矣。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无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3]王韬本人深受八股文之害,因而极力主张废除之。他说:“故时文不废,天下不治。”^[4]但是,他并不主张废科举,而是对其进行改革:仿照隋唐十科取士的办法,分别选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格致、舆图、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等学科的真才^[5]。时下之中国,既需要懂得中国经、史、词、章等传统学术的旧式人才,还需要精通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显现了王韬因时而变的早期维新思想。

王韬没有因为厌弃时文而主张废弃科举制度,说明他对科举制度尚有难舍与眷恋之情,功名情结一直潜存于心。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于上海寓所。邱炜萋在《五百石洞天挥尘》中讲到王韬时说:“去岁丁酉四月卒于沪寓,年七十一,先捐广文,后保太守,无子,遗一孙尚幼。”^[6]王韬平生有两大心痛之事,一是无嗣,二是无功名。正可谓:“死后无嗣知君痛,生不成名愧我文”^[7]。值得玩味的是,此前,王韬在香港期间还在发表文章“停捐纳”,自己却在晚年“贫病交攻”的情况下,花巨款“捐广文”、“保太守”^[8],科举正途走不通,就用例捐的办法得一个虚衔,以不负祖先的期望。功名思想在科举时代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清末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代,对于一位曾发挥过开风气之先作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也不能例外。

十年科举路,一把辛酸泪。透过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科举制度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始终笼罩着天下读书人及其家庭;或者像一根无形的藤,把文人学士紧紧地绑在封建专制统治这棵大树上,让人欲罢不能。专制王朝为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而根本不会关注应考者的疾苦与感受。在清末时期,像王韬这种有些异类的知识分子,想要挣破乃至摆脱这张网的控制,其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助的。

[责任编辑:肖波]

[1][2]王韬:《蘅华馆诗录》,第440页,第456页。

[3][4]王韬:《原才》,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6页,第8页。

[5]王韬:《变法自强》,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1页。

[6]萧永宏:《王韬生卒日期补证》,〔上海〕《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7]王韬:《王韬日记》,第102页。

[8]王韬捐广文、保太守,具体花了多少钱,尚无文献可查。根据1895年时他在致谢绥之的信中说到:“孝廉既可出二万金博得,又何必附生始可捐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66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王韬捐得两个虚衔,耗资一定超过“二万金”。